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吉田丰子

内容提要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国民政府 波茨坦会议 外蒙古疆界问题

前言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问题,除了承认其独立之外,还有疆界问题。目前,学界虽然关注波茨坦会议前后中苏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深入研究成果的并不太多。^①笔者根据中苏双方谈判记录发现,波茨坦会议前的谈判中,彼此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即接受苏方的建议决定不谈该问题。^②

^① 陈立文在《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第235—250页)中,曾提出了外蒙古疆界问题。王建朗在《大国背后的心酸——再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8页)中,主要利用波茨坦会议后期苏方谈判记录,介绍了外蒙古疆界问题。吴景平的《宋子文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肖如平的《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尤淑君的《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等相关成果中,也曾提及外蒙古疆界问题。

^② 吉田丰子:《1945年中苏条约缔结过程中蒋介石与宋子文对外蒙古问题之因应——以波茨坦会谈前夕为中心的探讨》,吴景平主编:《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笔者关于国民政府对外蒙古问题之因应及其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以下几篇:《国民政府对雅尔塔密约之应对与蒙古问题》,吴景平主编:《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权衡与抉择——再论1945年中苏条约缔结过程中国民政府之因应》,梁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权衡与抉择——再议1945年中苏条约缔结过程中国民政府之因应》,张俊义、陈红民主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第一,利用国民政府方面的史料,探讨波茨坦会议后的中苏谈判中外蒙古疆界问题再次出现的经纬;第二,主要利用中苏谈判记录^①,以及中方相关档案、日记等,从国民政府对苏交涉的视角重新勾勒出中苏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的谈判经过及其结果。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外蒙古问题在国民政府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一、波茨坦会议期间中方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的态度

(一) 蒋介石向苏方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

1945年7月18日,蒋介石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宋子文与蒋经国对中苏谈判的报告,审阅了中苏会谈记录后,对其自身做出的关于外蒙古问题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之决定深感后悔。^②显然,蒋介石非常清楚,公民投票的方式,对于斯大林而言并不会妨碍其要求的外蒙古之独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之策略是以承认外蒙古之独立,来换取苏联保证中国在东北之主权、不支持中共、不支持新疆叛乱这三项政治条件。^③为此,他提出采取公民投票方式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情况下,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提“民族自决权”为理论根据,防止国内舆论对国民政府威信之冲击的政治措施。^④

为使苏联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三项政治条件做出保证,7月19日,蒋介石召见了其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蒋介石首先对于《美英苏关于日本的协定》(以下简称“《雅尔塔密约》”)中关于外蒙古之条款,反复强调中方之解释为:“保持现状就是照目前情状中国有宗主权之谓,而绝非独立之意”,在此基础上强调中方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目的在于,苏联必须协助解决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主权之完整、中国共产党问题、新疆叛乱,并称:“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反对的意见,解决外蒙问题,而且外蒙问题只有在我当政时代由我手里可以解决,除我以外,任何人和任何政府都不敢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史达林元帅了解我国之牺牲重大。”^⑤

彼得洛夫回答说:斯大林强调苏联政府只承认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只承认蒋介石为中国的领袖,指出关于外蒙古与东三省问题是中苏互利。具体而言,即:第一,关于外蒙古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中苏间一切误会的根源,而且对于外蒙古人民屡次表示独立之愿望,苏联认为是合理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斯大林对中方意见予以重视,即现在决定外蒙古独立的原则,待战争结束及外蒙古人民投票表示其独立愿望之后再宣布其独立;第二,关于中国在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

^① 中方谈判记录,参见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一史料集的编撰特色是对中译版与英文原版皆有收录。苏方谈判记录,参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1937 - 1945 гг. Кн. 2(以下简称“PKO в XX. IV, Кн. 2”),M., 2000. 苏方对于斯大林没有参加的谈判均未作为正式的谈判记录。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7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③ 据《熊式辉日记》,1945年7月5日、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这一中方决策文件由熊式辉提议并起草。

^④ 吉田丰子:《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权衡与抉择——再议1945年中苏条约缔结过程中国民政府之因应》,张俊义、陈红民主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5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后,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民族自决”理论,向国人解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参见吉田豊子「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中蒙関係に関する試論」、石川禎浩編『現代中国文化の深層構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5年。

^⑤ 《拟主席与彼得洛夫大使谈话稿》,T. V. Soong Archives, Box 68, Folder 6,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566—577页;《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以苏解决外蒙之先决条件并对旅顺、大连及铁路主权与管理方式等问题提示意见谈话记录(1945年7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36—639页。

整。“因为顾虑日本失败后可能再恢复势力”，苏联才拟于旅顺港内建立针对日本的海军根据地，为期30年，且在此期间苏联预定在海参崴以北各港建立足以对付日本的海军根据地，在大连港苏联拟获得优势地位。最后，他总结说：“关于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使用问题，主要是为对付今后日本之可能的侵略，所以苏联在旅顺力量强大不仅对苏联有利，且对中国一样是有利的。”

在波茨坦会议之前的中苏谈判中，双方已经就“外蒙疆界”问题达成共识，即以现在之“疆界为疆界”，并在条约上不做任何文字说明。对这一共识，蒋介石此时却提出重新讨论，认为应根据民国初年中国所划定之地图为标准，“因为这张地图是最公平的，后来的许多地图都有变动，都不正确”。对此，彼得洛夫称，宋子文在莫斯科也提过一种地图，但是苏方始终没有见到，“现在最重要的是决定外蒙独立的原则，至于外蒙疆界问题可待日后来解决”。在此，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彼得洛夫提出了与斯大林之“承认现状”不同的主张，即暂时搁置。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而又提出外蒙古独立以后中国可与其正式建交的条件，彼得洛夫予以了肯定的答复。

(二) 外交部部长之更替与外蒙古疆界问题

1945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关于对苏交涉方针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如下结论：

甲、彼欲求得二十年之安定，以建立其国防，而我则欲求最近时间内以求国防之统一。乙、彼欲要求我旅顺与外蒙，巩固其军略基点，而我则暂时放弃此二地，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地，何况外蒙与旅顺皆非我立国致命之点也。丙、如我国家不能统一，则国防不能建立，如我不能在此时放弃此二地，则绝无时间允我统一也。先后缓急应有所择，列宁建国之初不惜放弃其东欧偌大领土者，乃求平定内乱统一国家也，而我何不敢为耶。^①

显然，上述引文反映了蒋介石对中苏谈判目标的分析。为“平定内乱，统一国家”，即解决中共、新疆、东北问题，蒋介石决定效仿列宁在建国初期放弃东欧“偌大领土”之先例，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条件。但是，对于这一决策之成败与否，蒋介石虽然顾虑重重，但也不得不孤注一掷。

宋子文自莫斯科返回重庆后，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不再赴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的要求，但美国建议继续由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② 蒋介石向宋子文单独说明对苏政策与交涉方针后，宋子文才改变不再赴莫斯科谈判的态度，答应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但不愿对结果负责。

由于宋子文不愿意对谈判结果负责，蒋介石决定任命王世杰取代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部长^③，国防最高委员会于7月30日通过了蒋介石的这一提议。^④ 翌日，宋子文明确提出中苏条约交由王世杰签字，当时王世杰曾问宋子文可否由其两人共同签字，宋子文予以拒绝，但又称如果苏方由斯大林签字他就签字。“实际上，苏方自行将由其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字”，中方签字人选定为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8月1日，王世杰开始在外交部视事。^⑤ 2日，关于在波茨坦会议之前的谈判中宋子文已经向斯大林做出的承认外蒙古独立，且不提疆界问题的承诺，王世杰认为：“余意疆界之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7月28日，“杂记”；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第627—637页。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fice, 1943), pp. 952-953.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8—559页。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7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7月29日，宋子文曾向王世杰要求待五国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王世杰再接替其外交部部长之职，但因已经不能改变国防最高委员会即将承认王世杰为外交部部长之事实，宋子文也自知这是无理的要求。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7月29日。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1日。

划定必须在承认之前,否则将为未来留无尽之纠纷。”如前所述,蒋介石与彼得洛夫大使谈话时,已提出希望重新讨论外蒙古疆界问题的要求,因此这一具有策略性的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同意。^①

同日,蒋介石与宋子文、王世杰商谈了对苏谈判方针,即关于外蒙古问题,决定在承认其独立之前必须先划定疆界为要。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关于这一决定称:“上次幸未签约,否则将铸成大错矣。”^②

在启程去莫斯科前一日的8月4日,王世杰在其日记中写道:“予觉此行之目的可以三语括之:统一、和平,与保全东北。但外间对于外蒙问题亦颇有异论。如舆论不能深深了解,则谈判有成,中苏之感情仍将不协,前途之变化仍甚可虑。”^③由此可知,王世杰对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后社会舆论的忧虑之深。8月5日,宋子文与王世杰、熊式辉、蒋经国、沈鸿烈、卜道明、刘泽荣等一行17人与彼得洛夫大使及其同行之苏联人员4人启程赴莫斯科。

王世杰一路上心情之沉重及其忧虑,在日记中表露无遗:

予一路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但自思“统一与和平”为中国目前必须本着与八年抗战同等之勇气以求取。否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

次女于予临行前,在予日记册吸墨纸上书此二语,以壮予行:“Don't be afraid of opposition. Remember, a kite rises against, not with, the wind.”^④

二、波茨坦会议后中苏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一) 苏联对日作战前中苏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8月7日午后3时,宋子文等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双方举行了会谈。^⑤会谈主要围绕中方事先提出的旅顺、大连、铁路等问题展开。然后,中方又提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方同来人员熊式辉将军可与苏方军事人员会谈;第二,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第三,关于日本政府及其私人在东三省的产业移交给中国还是作为苏联“战利品”的问题;第四,要求同盟条约中不兼提德、日而只提日本。对此,斯大林表示同意。

在讨论外蒙古疆界问题时,宋子文出示了一张中国地图与一张苏联地图。莫洛托夫问,两图之疆界有无不同,宋子文回答是相同的。关于苏联地图,斯大林与洛索夫斯基怀疑可能是日本伪造的版本,而间接表示不予接受。但是,宋子文主张,中方想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就疆界问题与苏方达成共识。对此,斯大林坚持波茨坦会议前中苏谈判的“共识”,即不谈外蒙古疆界问题。此时,宋子文以“避免发生冲突”为由,再次强烈要求“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此时,斯大林才答应可以谈判。^⑥其中,所谓“某些方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2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4日。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4日。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5日。

⑤ 中方谈判记录中译版与英文版,参见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第251—257,557—564页。苏方谈判记录,参见PKO в XX. IV, Кн. 2, №. 693。

⑥ PKO в XX. IV, Кн. 2, №. 693。

面”，具体是指1944年春“阿山事件”时产生纠纷的新疆省北部阿山区与外蒙古接壤之地带。^①

苏联对波茨坦会议前的中苏谈判也进行了总结。其中，《截至1945年8月6日中苏之间仍未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之中，关于边界问题之整理为：1.“关于中苏边界地段新的边防委员条例的问题。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新疆的全权代表于1944年2月1日提交”；2.“双方审理了边防委员条例，但是，由于签署程序方面存在着分歧，条例还没有付诸实施。中国方面还建议签署关于召开边防委员会的程序的单独协定”；3.“鉴于新疆所发生的事件^②，目前，我们并不关心与中国人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已经给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下了指示：通报中国人，目前苏联方面正在研究这些建议。问题已经提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法律司作结论”。^③《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关于中苏关系的主要分歧报告（1945年8月）》^④之中，完全没有提及边界问题。但是，在这次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却表示同意谈外蒙古疆界问题，其意图无疑在于防止中方以此拖延中苏条约之缔结。

8月8日上午，中方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及若干附属协定，按照与斯大林的谈话拟就后，送至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⑤根据苏方档案，当晚提交的文件还有《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之照会》《关于从东三省撤出苏军问题之备忘录》。^⑥然而，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并没有中方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苏蒙对日宣战后中苏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早已掌握美国开发原子弹的情况，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也早在苏联的预测之中。因此，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行动之迅速，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⑦获知8月6日美国轰炸日本广岛的消息后，莫斯科各报纸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宣战，通过以下中苏谈判过程的分析，可知苏联这一决定的最大目的在于造成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以迫使中国早日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

获知日本投降的讯息后，8月10日，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蒋经国等仔细商谈了今后中方对苏条约所应采取之态度。为防止谈判决裂，除熊式辉之外，大家一致认为关于外蒙古疆界不必坚持以中国地图为标准之既定方针而做出让步。由于熊式辉极力反对，最后，他们商定以下两点：“第一、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第二、不作任何让步。”^⑨

① “阿山事件”是指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新疆省北部阿山区与外蒙古接壤地带的边界纠纷。当时苏联通过塔斯社声明根据1936年的《苏蒙互助条约》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行动引起国民政府对战后外蒙古地位问题的高度警觉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对同盟国之间出现的这一严重问题，深感忧虑的美国曾派遣以其副总统华莱士为团长的代表团居间调停。参见吉田丰子《“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的对苏外交——从“阿山事件”到华莱士访华前后（1944年3—7月）》，吴景平主编：《民国人物再研究与再评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指“阿山事件”。

③ PKO в XX. IV, Kh. 2, No. 691.

④ PKO в XX. IV, Kh. 2, No. 692.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8日。

⑥ АВПРФ, ф. 6, оп. 7, п. 36, д. 507, л. 84.

⑦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7–251.

⑧ 《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8日。

⑨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二三事》，《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10日。《王世杰日记》（手稿）第5册，1945年8月10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于8月8日致电宋子文，告知参议员胡秋原散发的传单称，中苏谈判如果外蒙古主权发生变更，“将在国际上开一不良先例，而中国亦将毫无安全可言”，胡秋原并在此前辞去《中央日报》主笔之职。王世杰在致陈布雷的复电中称：“苏联对日宣战大局益趋紧急，此次交涉如获结果，仍需全国舆论一致，方能希望苏联对华政策切实改变，胡君事似宜请总裁密予切实指示，一切如何乞酌。”（《来电 No. 0002/3》，《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往来电报清稿》，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另有“原稿”，但“原稿”与“清稿”不一定全部重复，“清稿”所收录的往来电报较全面）。这一突发事件，或许是在莫斯科谈判人员及蒋介石在外蒙古疆界问题上做出不向苏联让步的原因之一。

8月10日21时至23时30分,斯大林参加中苏会谈。^①斯大林问宋子文是否仍然签订条约,宋子文回复称:“吾人亟盼于日本投降之前,签订条约。因在投降之前签订,对于人民较易措辞。”然后,斯大林关于外蒙古疆界指出:“吾人准备将‘并在将来’数字删去,中国地图所绘制之疆界,根据不足。现行之疆界,应予承认。”

莫洛托夫提出:“吾人必须获得协定”,宋子文复称:“吾人亟盼于日本投降前获得协定。因在此以后,将更难以对吾人民。吾人已作战八年,人民不能了解何以吾人作此让步。”即关于在日本投降前夕必须签约这一点上,虽然双方目的不同,却是早已不谋而合的。

会上,宋子文强调了中国在外蒙古及其他问题上已经做出的让步。对此,斯大林强硬地称:“外蒙无论如何,业已丧失,且已对日宣战。”宋子文依然强调中国丧失外蒙古牺牲之重大,称其面积占全中国七分之一。斯大林反驳称,外蒙古为荒漠地区,广东省的一小块土地之价值就相当于外蒙古的20倍。

关于中苏条约草案的逐项讨论中,争议最多的是外蒙古疆界问题。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坚持“照现行之疆界”。王世杰却称:“阁下愿避免纠纷。外蒙之疆界为纠纷之主要原因。吾人并不希望任何利益,故吾人带来一大学通用之地图。此项地图系一般人公认为权威之地图。现吾人被要求承认外蒙之独立,吾人必须明示人民吾人所承认之领土为何。吾人必须在承认之前对疆界有大体之决定。在此地图上境界与吾人交阁下之俄国地图相同。”

斯大林反驳说:“现行疆界之确定,已有二十六年,中国迄未提出任何异议。苏联制图家曾赴该地,并在地图上依照中蒙边境警卫分界之线划定。关于东线,与日人一度争议后,已订立协定。倘吾人重行研究疆界,将耗费甚久之时间。若干地域应予包括在内,若干地域应予划出。君等之俄国地图并非有效者。”莫洛托夫补充称,中方出示之地图为日本人在“海尔克金廊战役”之后送交给苏方的,并与斯大林持同样主张:“容吾人接受现行之疆界。”斯大林认为,中方在拟觅借口以撤销已同意之事项。宋子文辩解道,并非觅借口而是中方需要清楚界限之所在。王世杰提出:“在此间无人对疆界问题有研究。吾人带来之地图系公认为权威之地图,并为中国各地所用者。倘阁下反对余之建议,余可别作一建议。吾人或可稍缓结束吾人之谈判,同时贵国有研究之人士可赴重庆与我国制图专家觅求疆界之协定。”

斯大林认为王世杰的提议:“非正常办法。倘现行疆界改变,外蒙古人必将起骚动,彼辈企图与内蒙合并^②,最好勿提边界问题”,并称:“为防止蒙古人有何梦想起见,外蒙应予承认。倘届时彼辈希望有内蒙,可以战争相威胁。苏俄决不助彼扩张其疆土,则彼辈自将归于宁静。”

苏方谈判记录表明,宋子文、王世杰与斯大林另有针锋相对的激烈讨论。宋子文直接提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地图”。但是,斯大林避而不谈当时的苏联地图^③,却说:“你们有你们的哨所。边界上有标志。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端。”王世杰指出:“去岁在新疆和外蒙发生了争端。”斯大林辩称:“但不是因为边界。那是围绕跨越边境的奥斯满哈萨克领袖引发的争端。外蒙古没有把他交出来。不是关于边界的事情。”王世杰回答说:“这对我们而言是个难题。我们希望能消除引发分歧的一切根源。我还没有与我的同事协商。建议在我们的协议中加上这样一条:中国与蒙古当局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对蒙古国的承认生效。”斯大林敏感地提出不能接受这个建

^① 中方谈判记录中译版与英文版,参见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第257—264,564—573页。苏方谈判记录,参见PKO в XX. IV, Кн. 2, №. 699。

^② Christopher P. Atwood, “Sino-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Mongolia, 1945 - 1946,”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37 - 161.

^③ PKO в XX. IV, Кн. 2, №. 703.

议,理由是:“这是对独立的否认。所达成的协议要被推迟一段时间。你们收回了你们的协议”,即斯大林认为这是中国想收回已经达成的外蒙古独立协议的借口。

此时,宋子文指出在8月7日的会谈中,苏方已经同意就中方所提出的“我们希望了解边界线在哪里”的要求进行谈判。随之,王世杰再次建议,如果苏方不承认中方地图,暂缓下结论,请苏联先派专家到重庆,关于边界问题与中方的地形测绘师达成共识。莫洛托夫提出外蒙古人也应该参加测绘。斯大林则称外蒙古有统一内蒙古的企图,如果还要提出缩小其疆界的话,则“蒙古人会造反的”。然后,他指出中方应该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如果外蒙古要统一内蒙古扩大边界,苏方将以武力威胁他们。即是说,苏方要求中方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不谈疆界问题,并间接表示以1940年苏联的地图为准。^①

(三) 国民政府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谈判的最终结局

蒋介石于8月9日晨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晨接俄国对日宣战之消息,忧喜参半,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之祸福关系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当晚,蒋介石召集各院院长谈苏联对日参战问题。^②8月10日晚,蒋介石得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③由于两日没有接到宋子文的来电,更增加了蒋介石对中苏谈判的忧虑。^④

8月11、12两日,中苏双方对条约具体条文进行了逐项讨论,但对于10日谈判时的争议问题,并没有进展,只是对若干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宋子文与王世杰在12日致电蒋介石,汇报了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即:“苏方允以只接济我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内政,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至外蒙疆界苏方不愿在换文中作任何规定或声明,……职等默查以上数点,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今日拟再作一度磋商,倘明日内钧座别无指示,拟就商定结果与苏方签字。”^⑤

8月12日,宋子文收到蒋介石回电,其中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蒋介石态度强硬地指示:“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限,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⑥

王世杰认为,“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发生根本变化”,但宋子文、钱乙藜、蒋经国、傅秉常等主张不顾蒋介石的指示,直接与斯大林谈判。王世杰极力主张万万不可,理由是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同意,则未来国内意见纷纷时,即使条约签了字,也未必能够获得批准,并且提议停止当晚与斯大林的谈判,而致电蒋介石说明一切,请蒋介石授权宋子文与其全权处理。

同时,王世杰提出在外蒙古问题换文中,加入斯大林所主张的以现行边界为限之字句,以便在条约中表示中国不承认1919年以前之旧疆界,此前新疆之阿尔泰区属于外蒙古,显然,在文字上期

① 其中将“阿山事件”纷争地等划归外蒙古。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9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0日。

④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两日来未接子文来电,甚念。恐对俄交涉发生变故也。”

⑤ 《第二次访苏第六号,上主席电》(1945年8月12日),《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来往电报原稿》, 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 查 雅尔达秘约与中苏协定》(其中收录了大部分电报的原件),台北,“国史馆”藏,总统府机要室恭辑,1975年6月,下同;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96—97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8页。

⑥ 《来电 No. 0010》,《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来往电报清稿》, 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 查 雅尔达秘约与中苏协定》;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101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7—648页。

待保持中方援用苏方之主张的意图,不仅在关于1944年“阿山事件”的边界问题上,还有为未来收复纷争要地留下条文根据的考量。可以说,这一点在后面引用的王世杰于8月13日致蒋介石电文中表露无遗。

于是,宋子文等接受了王世杰的提议,决定当晚不与斯大林会谈,并分别以宋子文与王世杰联名,以及蒋经国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外蒙古疆界问题已经不能坚持蒋介石的指示,主要理由有:1. 苏方似乎没有以此作为未来纠纷的考虑;2. 苏方已经怀疑中方以外蒙古疆界问题为由拖延签约,为防止发生意外,必须从速订约,因此强烈要求将其他未决事项交由宋子文与王世杰全权处理。^① 13日午后,宋子文又主张不等蒋介石的回电而立即与斯大林会谈,但王世杰坚持关于外蒙古问题必须在接到蒋介石之复电并经允许之后方可谈,宋子文才同意在收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报之前不与斯大林会谈。

8月13日,王世杰关于外蒙古疆界问题,又另外向蒋介石发出了非常详细的电报:

职与宋院长上钧座未锡电,计已呈阅。钧座侵电囑由经国兄转达史大林之理由。职等日前已代表钧座向史宣布剖切申述。史谓25年来外蒙疆界并无纠纷,现如提出,徒引起外蒙古人之种种要求,我如要求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云云。职当谓去岁新疆、外蒙之冲突,即是一种边界纠纷,史氏谓此事起因并非边界问题。职又请其派人立即来渝划定图界,史氏亦认为不可。史氏始终亦未自行提出苏方外蒙地图,窥其原因,不外二者:一则苏方预计彼之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当非驻华大使所能接受,揆之实际,我确不能于放弃外蒙领土之外,复放弃任何新疆领土。二则唐努乌笃[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现则已成苏联一属国。^② 总之,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成果,不胜惶恐。但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就我方利害言,则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立变,前途隐患甚大,权衡至再,职与宋院长拟于接到钧座授权解决之电令时,再向史氏作一度谈判,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时疆界为限之字句列入换文中。盖有此一语,则在约文上,我国显然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属于外蒙之旧疆土为外蒙疆土。事态严急,用特渎陈,并乞垂察。^③

同日,宋子文与王世杰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其中称:“未锡[12日]电悉,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④

8月13日深夜12时至次日2时,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⑤ 首先谈判的是外蒙古疆界

^① 《第二次访苏第9号,上主席电》(1945年8月12日),《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来往电报清稿》,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 查 雅尔达秘约与中苏协定》;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102—130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9页。

^② 1944年被苏联吞并。参见《十月革命后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简要经过》,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5页。

^③ 《王部长致蒋主席电抄存备查》,《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来往电报原稿》,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 查 雅尔达秘约与中苏协定》;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112—114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50页。

^④ 《来电 No. 0013》,《自34年6月27日访苏期间有关交涉之来往电报清稿》,T. V. Soong Papers, File 58. Folder 17;《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 查 雅尔达秘约与中苏协定》;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114—115页。

^⑤ 中方谈判记录中译版与英文版,参见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第275—279、584—589页。苏方谈判记录,参见PKO B XX. IV, Kн. 2, No. 708。

问题。宋子文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关于该问题的态度,称:“蒋委员长原先同意先确定疆界,再承认其独立,但阁下说这样会拖延太久,所以蒋委员长现在接受业已存在的疆界。因此,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同时,宋子文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草案,并且顺利地得到斯大林的同意。

以此为基础,苏方在关于铁路、大连、旅顺“中苏军事委员会”的谈判中,都做了某种妥协,使条约在日本宣布战败之前得以签署。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外蒙古疆界问题首先由蒋介石向苏方提出。对于承认外蒙古问题忧虑重重的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对苏交涉方针,即将疆界之划定作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前提。这一交涉方针的目的不仅与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有关,而且作为交涉筹码,也是为了尽量压缩以《雅尔塔密约》为基础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主权利益的侵害程度。当然,这一问题也并非没有根据具体情况作为拖延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可能性。

第二,在苏联及外蒙古先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态度愈加强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方面赴莫斯科的谈判要员,为了避免苏联在东北支持中国共产党等不测事件的发生,深刻地认识到与苏联缔结条约的紧迫性,宋子文甚至提出在没有蒋介石的最终指示之前,就直接与斯大林谈判。对于未决问题之一的外蒙古疆界问题,王世杰提出与苏联互相妥协的方针,即放弃先划定疆界再承认其独立的既定方针,而向斯大林提出将其坚持的以现在疆界为限之提议在条约中付诸文字记录。中方的目的是将其解释为不承认1919年以前的疆界,也就是坚持1944年“阿山事件”时中方关于边界的主张,为将来确保新疆北部要地之交涉留下余地。苏联为了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与国民政府缔结条约,在外蒙古疆界问题上,最终接受了中方关于其文字记录的要求。

第三,1946年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提出的疆界问题恰恰源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规定所赋予的意图。1946年,国民政府就边界问题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通过谈判予以解决,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坚持与苏联保持一致。^①对国民政府而言,外蒙古疆界问题的“悬而未决”,成为双方虽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没有互换使节的要因,并于1947年再次酿成以疆界纠纷为导火索的“风云一时”的北塔山事件。^②北塔山事件不仅是当时国民政府向联合国间接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在1949年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正式提出的“控苏案”中也被列为重要内容。

[作者吉田丰子,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国际关系学科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吉田丰子「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中蒙関係に関する試論」、石川禎浩編『現代中国文化の深層構造』。

② 吉田丰子:《转折时期国民政府对苏与对美政策之关系》,石川禎浩主编:《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